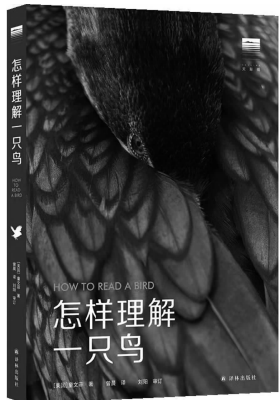


观鸟的意外收获

□ 华明玥



《怎样理解一只鸟》
董文菲著
译林出版社
2023年8月

这几年,观鸟成为与City Walk一样热门的休闲活动。观鸟人配备长枪短炮,穿着迷彩冲锋衣,头上戴着插满草茎与野花的柳条帽,把自己伪装成一小块浮动的草地,为的是近距离看到鸟儿觅食、筑巢、欢歌、孵化的场景,观赏鸟类像人类一样的独居或群聚生活。

生物学家董文菲,也是一位从12岁就开始观鸟的沉迷人物。她所写作的科普读物《怎样理解一只鸟》,赋予了全书迷人又精巧的写作架

构,她仿佛吐出了无穷无尽的丝线,将自己掌握的博物学与生态保护学的知识,与鸟类摄影作品、科学图例、友人的水彩画以及对自然生境的描摹等,以同心圆的方式紧密而又巧妙地编织在一起,绘制出鸟类私生活的丰富图景。整本书的结构丰富而又巧妙,恰似一只巧扇尾莺以唾液丝线,将草与树叶粘在一起,粘成了一只摇晃在阳光与阴影间的“伪装性鸟巢”。

董文菲写了上百种鸟儿的生活故事,并发掘了某些鸟与文学艺术及科学研究的深刻关系。例如,紫翅椋鸟颜值很高,色彩斑斓、绿紫相间,在《亨利四世》中,威廉·莎士比亚曾歌颂过这种鸟的巧舌如簧。它用多种人类语言说“我爱你”,也能吟诵简单的诗句。音乐家莫扎特也饲养过紫翅椋鸟,这只被昵称“小丑”的鸟儿死后,忧郁的莫扎特,还为其专门写了一首挽歌悼念它。这种鸟儿颇通人性,因此它被植入跟踪芯片,成为生物学家钟爱的研究物种。

人类和鸟类,能在多大程度上真正互相认同和相互理解,是本书提出的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。鸟类的进化与繁衍,引导人类离开钢筋水泥森林,伸出感知的触角,来触摸周围这个丰富多彩的世界。以紫翅椋鸟为例,在面临较高的环境风险时,雌鸟可能对雏鸟进行“编程”:它通过提高卵巢中的应激激素水平,

孵化出飞行肌肉更发达的雏鸟,从而令它们成功地躲避捕食者。

我在这本书中不时地看到人类活动对鸟类的影响。有时,人类的影响是正面的,鸟类在城市翻找到高热量饮食后,它们头脑中有关发明创造的智慧似乎得到了激发。例如,日本的乌鸦会把自己打不开的坚果放在十字路口,利用来往的车辆碾碎硬壳,并且在行人过马路的时候从容进食。青山雀最喜欢吃瓶装奶顶部凝结的奶皮,它们赶在主人开门取奶之前,跳上台阶,揭开玻璃奶瓶上的锡箔纸,把顶部凝结的奶皮吃掉。悉尼的葵花鸚鵡会打开垃圾箱,寻找自己爱吃的食物。在视频网站上,一只名叫“雪球”的葵花鸚鵡是大网红,它甚至能衔起树棍,跟上流行音乐的节拍,激情四射地演奏,让它的人类粉丝大吃一惊。

当然,人类活动对鸟儿的生存也并非完全是正向的影响。来自公路和油田的噪声污染扰乱了艾草松鸡的求偶活动,导致这一物种濒临灭绝。一种叫鸚的鸟儿特别喜欢收集人工合成的捆包线,鸚用喙将绳子打结,将它们的大型鸟巢绑在一起。这当然可以抵御大风的摇曳,但生物学家和牧场主们不得不尽量回收散落在田野里的捆包线,修剪鸚的鸟巢,防止缠绕及窒息悲剧再次发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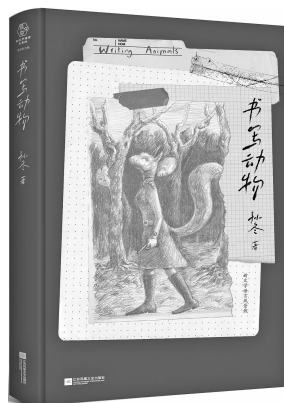
人类活动带来的杀虫剂污染、光污染,还

有摩天大厦的玻璃幕墙,对鸟类都十分不友好。几个世纪以来,首先是海上的灯塔吸引了无数迁徙的鸣禽,扰乱了它们头脑中的迁徙线路图,从而迷失方向。接着,高层建筑内的灯光也误导鸟类,导致它们与玻璃发生强烈的碰撞。光是在北美,每年就有约6亿只鸟因撞向摩天大楼而死亡。为了缓解这一状况,我们可以在摩天大楼的玻璃上看到微小的白色圆点,高速列车上也采用了这种车窗玻璃,它们并非多此一举——因为鸟看得见这类图案,可减少90%的撞鸟意外。

《怎样理解一只鸟》这本书,作者在很多场景下化身为一只鸟,讲述它的一路征程,糅合了众多的喜怒哀乐,解释了鸟类行为的合理性,引导我们理解鸟类很多看似不可思议的行为。董文菲的文字活泼生动,穿插着奇闻逸事和亲身经历,将经典的案例和最新的研究结合在一起,绘制出一幅引人入胜的精彩画卷,加深了我们对鸟类行为多样性和丰富性的认识。是的,唯有放下傲慢,尝试以一只鸟的角度去理解它的生存压力,才能从一只鸟、不乱扔垃圾、减少光污染以及将捆包线悉数收藏这样的小事做起,让我们的子孙后代,仍能看到“两个黄鹂鸣翠柳,一行白鹭上青天”“百啭千声随意移,山花红紫树高低”的生动景象。

接近动物与人的界限

□ 杜鹏



《书写动物》
孙冬著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2023年7月

孙冬的诗,几乎完全和当代诗传统无关,与很多女性写作者所“继承”或者“暗合”的“女性诗歌”传统更无关。她的写作有很高的辨识度,她甚至不屑于去打破某种已经固化的传统,便足以自成一家。

初读《书写动物》,我的第一个感受就是,我终于读到了一个不写抒情诗的女诗人。自朦胧诗以来,大部分有影响力的女诗

人“出场”时,往往以抒情诗人的身份,以至于“抒情”几乎成了一种对女诗人一个固化的印象。当然,我不是否定“抒情”的意义,我甚至比较固执地认为,一个人选择什么样的写作方式,往往直接是和自身的“体质”有关。哪怕是对“抒情”有意识地抑止,也是为了更有效地“抒情”。而在我对孙冬的阅读中,无论是这本《书写动物》,还是她之前的《破鸟鸦》以及与人合著的《残酷的乌鸦》,她这么多年的写作几乎完全回避了诗歌的“抒情”,追求一种更加智性、更加硬朗的写作,用路东的话说,这是一种“不买账”式的写作。

与侧重情感抒发的写作一样,侧重智性的写作同样是有风险的,很容易形成“语言的空转”。作为一名成熟的写作者,孙冬对这种“空转式”的写作有非常自觉的警惕。在写作策略上,孙冬试图用一种“以退为进”的方式处理现代经验。值得强调的是,孙冬的“退”不是“退回”传统,而是从人“退回”物,就像序言中所说,“孙冬试图接近动物与人的界限,并坍塌此界限。”正因为孙冬这种“以退为进”的写作策略,使得她的诗歌自带一种“去象征化”的能力。

无论是为诗还是为文,汉语写作有一个传统:“修辞立其诚”。“诚”在汉语数千年的写作中显得尤为重要。但到了今天,“诚”可能并不完全是一个优点,甚至有时候,反而会加速语言的腐败。在孙冬这样以“反讽”和“解构”为主要驱动力的诗人里,“诚”某种程度上来说是隐退的,或者说被“解构”的。比如这首《突然天晴》:很多未了情在梦中/开始分化,新的过去加入进来/天空满脑子是大海/把太阳当作了方向的一片叶子/就想犯一些方向错误

这首诗里,“大海”“天空”“太阳”这样的意象都是很容易让人陷入某个象征系统的陷阱,这样的陷阱和上文中提到的“修辞立其诚”之间有一定勾连关系。孙冬巧妙地用凸显这些意象存在的方式,抽取掉了诗歌中的“诚”,使其呈现出一种“悬置”的状态。而正是因为“反讽”的存在,孙冬的“悬置”并没有让意象形成“空转”,反而呈现出了一种基于语言本身的戏剧性。

除了关注语言本身的戏剧性之外,孙冬还擅长在“意外”上面做文章,以这首《谍》为例:安卓系统里总/有一个人/他游手好闲,负责/传导神的旨意,他的第一人/叙述者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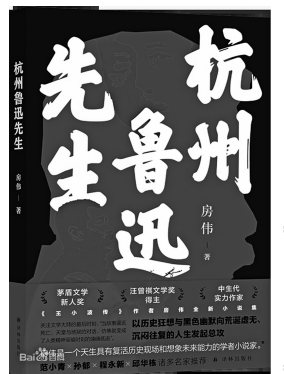
杀死宿主/还把它制造成一场/意外更新

《谍》是一首带有很强寓言特质的诗。孙冬创造出的这个“人”,既有虚拟的一面,也有现实的一面。这个“负责传导神的旨意”的闲人在这个“安卓系统里”更像是现实中人的“镜像”。通过对虚构本身的又一次虚构,孙冬用“叙述者杀死宿主”这样一场事件上的意外完成了一次系统的“意外更新”。而这种“意外更新”不仅是系统层面上的,同时也是对语言本身的感受力上。

通常来讲,偏智性的写作很容易写得过于观念化。可贵的是,孙冬的诗虽然源于观念,却没有止于观念。孙冬的诗虽然始于“思”,但没有终结于“思”。在她的诗歌里,“能指”和“所指”之间的关系是可以互为主体的。她找到了反讽这一利器,并为这种反讽提供了一种罕见的层次感。换句话说,孙冬诗歌的活力就源自这种对于反讽本身的反讽。由于天然对“抒情”的免疫,孙冬的诗里并没有一个或者几个强大的抒情主体,也没有拘泥于某种常识,而是试图提供一种新的“智力”。很显然,相较抒发“情感”而言,对于“智力”的彰显更能体现出一个诗人的勇气。

小人物如何介入历史

□ 李怡雯



《杭州鲁迅先生》
房伟著
译林出版社
2023年8月

房伟的中短篇小说集《杭州鲁迅先生》包括八篇特定取材的中短篇小说——不论是民国、现代还是科幻背景,其内容均与知识分子的“生死”有关。真假鲁迅相遇在动荡年代的书店一隅;元叙事之下按图索骥郁君的死亡之谜;濒死时刻,自电脑屏幕游曳而出的魂魅海妖;小说家如何得以潜行篡改外卖员的脑内世界……作家房伟选取历史或诙谐或紧张的瞬息时刻,以此

作为文本构建的基础,并着重于刻画这些事件中“大历史”背后所潜藏的“小人物”信息,从而对历史洪流之下普通人颠沛流离的命运,进行深度的关注与深入的挖掘。

在小说集中,小说的主要叙事者设置为以世俗面目出现的“小人物”,在围绕故事中心展开叙事的过程中,作家草蛇灰线铺陈出一条个人化、情绪化的生存轨迹。无论是《“杭州鲁迅”先生二三事》中的周预才、章谦,《外卖员与小说家》中的建民、宇文无量,还是《侧写师遗情录》中的柳原、兰成这些小人物在叙述文本中呈现出一种平凡的庸俗面目,他们的生命并不因其叙述者的身份就特殊或者伟大,具体琐碎、鸡毛蒜皮的生活细节在“大历史”基调的压抑下,被抽象成一个单调的符号背景,虽是个体,却仍然以群体的面目出现。

“小人物”要如何摆脱历史边缘位置,以合法姿态出现在历史中?《杭州鲁迅先生》这部小说集在某种程度上指明了答案的方向。小说中的小人物并非只是叙事的托辞,而是以其展露“绝境”之外另一重生存空间的能力,委婉而不容排斥地介入到历史之中。《“杭州鲁迅”先生二三事》中“假鲁迅”与真鲁迅的

伟岸形成对比,前者又与“梅先生”的狡狴互为衬托;在故事之外,“我”的油滑也反复影射着故事作者“章谦”的木讷。重者重于泰山,轻者轻于鸿毛,英雄自成赞歌,而影子永远沉默。本不该、不能相提并论的情境被作家有意并置,相互连属,于是同者之间展开横轴的比较,异者之间拉宽纵轴的扩面,也就和其余七篇小说一起构成一个大而总的叙述文本,指向小说集的叙述重点:小人物。

在大历史的背景下,小人物的生命永远以大人物、英雄人物的时间为主线,在这个主线推进的历史过程中,其每一步行进,都侧面印证着个体生命无奈的覆辙。学者王德威以“小说中国”来形容主流叙事之外,小说文本对宏大叙事的反抗,也即在虚构之余,以一种缝隙视角来观察历史。历史常以“绝境”姿态出现,历史人物作为丈量历史的尺度,必然以其行动面对、践行历史,使线性的时间历史化为空间性的存在,作为书面话语来对抗遗忘。此处的“绝境”,正是《杭州鲁迅先生》里八篇小说各不相同的历史背景:《“杭州鲁迅”先生二三事》鲁迅所面对的风雨飘摇的动荡中国,《一九九七年“海妖”事件》王二生前将迎的互

联网元年,《侧写师遗情录》末日大环境下的巨型社区……绝境之中,历史人物行动,历史坐标生成,空间内除主体外的所有都成为历史的背景。这是读者向来熟悉的叙事方式,不论是批判现实主义还是浪漫主义,“绝境”模式下的历史形状都各有来历。而在绝境之外进行书写,是一次踏出主流的探索之举。历史在这里不再权威不可撼动,向来身处历史边缘的普通人的声音,随着叙事的进行愈来愈盛。小人物的生存姿态在文本的不断叠加中,开始以具体的面貌介入历史。诗人兼作家余光中曾言:“历史健忘,难为情的,是患了历史感的个人。”《杭州鲁迅先生》小说集正是以具体的叙述话语,将小人物所拥有的历史感作为他们介入历史的方式。

作家房伟的这部《杭州鲁迅先生》小说集,之所以能够让让面貌始终平凡的小人物不喧宾夺主地站在历史当中,归根结底,是因为其独特的叙事安排。绝境之外的小人物因为这份渴望存在的“历史感”,模糊的面目开始随着真实可信的细节变得清晰,哪怕历史“健忘”,也不得不因为这些患有“历史感”的个人,而将之容纳其中。